

破灭的改革之梦：司徒雷登与危机中的国民政府

作者：王建国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16

在极大地影响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美国开始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战后，美国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实行西方主体制的国家。因此，要求国民政府进行内政改革便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围绕着改革所产生的要求和回应形成了战后中美关系中的种种纠葛。在马歇尔使华时期，美国已提出改革要求。有关马歇尔使华的活动，已有诸多论述。大体上可以概括地说，这一时期马歇尔活动的重点放在促成国共和解并组成联合政府上。马歇尔离华后，美国放弃了组织国共联合政府的希望，它所要求的改革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自身的改革上，而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以一个面目一新的国民政府来抑制共产党的发展。本文所论述正是这一时期。

一

马歇尔在离华前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询问鉴于国共和谈破裂，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策。司徒雷登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希望它作出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相机而行，走着瞧；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司徒雷登主张采取第一种，否则，他宁愿选择第三种，马歇尔对此表示同意。此后，司徒雷登在其任职期间正是按照第一种方针而展开行动的。（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70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按照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司徒雷登把推动宪政建设，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体作为改革的一个首要任务。对于1946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尽管司徒雷登对它的许多地方并不满意，但他对这次大会还是给予了相当乐观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蒋介石终于不顾党内最保守的CC系的强烈反对，对保守派施加了很大压力，从而使比战前的“五五宪草”要民主得多的宪法获得通过，“它标志着委员长的思想进步了”。司徒雷登此时对蒋介石满怀希望。（《在华五十年》，第163页。）

根据制宪大会的安排，将于1947年底召开行宪国大，从而正式结束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作为行宪前的必要准备，司徒雷登首先把他的精力集中在组成一个有在野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上。1947年2月7日，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就政府改组问题进行了商谈。司徒雷登提出三方面措施供蒋介石考虑：1. 在除行政院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增补非国民党员；2. 在行政院内部进行调整；3. 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不想对掌握实际权力的行政院大动手术，他表示，行政院是实际上的施政机构，地位重要，不可轻举妄动。他倾向于采取第三方面的措施，即对位尊而权虚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进行改组，允诺使其拥有决策实权。（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2月8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P.P. 34-3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3月份，围绕着“行宪”，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似乎颇有声势。国民政府成立了“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由立法院长孙科任会长。青年党人曾琦、民社党人徐傅霖、无党派人士莫德惠、国民党人张继分任副会长。至4月1日，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总统与副总统等的选举与罢免法以及国民大会与五院的组织法。此外，还给现届立法院新增委员50人，其中非国民党人士32人。新增监察委员25人，其中非国民党人士16人。3月份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还先后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政治改革案》和《经济改革方案》等。

但改组国府委员会的进程比较缓慢。其时，在较有影响的在野党中，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小党为了要在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职位，与国民党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而一些无党派人士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并不看好，尚不愿意加入联合政府。因此改组政府的进程比较缓慢。至4月中旬，有关各方终于就此达成协议。

4月18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正式宣布了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名单。新的国府委员会由24人组成，12名为国民党人，12名为其它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此外，国民政府的5院院长是当然委员。蒋介石宣称，中国至此已形成多党之政府矣，“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政府之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蒋介石：“国府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步骤”，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227页，台北1984年版。）

司徒雷登对国府委员会的改组结果比较满意，他认为这次改组吸收了国民党内最能干最新式的人才，并排除了反动的CC系和居统治地位的军人集团的成员。他感到“政学系中最杰出最能干的人物”如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人的入选，邵力子和宋子文的入选以及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主席，都很令人振奋。司徒雷登对入选的无党派人士也很满意，“总之，国府委员会的构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从无党派人士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具体的改革。”（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4月19日，FRS, 1947, VOL. 7, P. P. 103-104.）

当然，司徒雷登并未天真地认为成立了新的国府委员会后便万事大吉了。他注意到国民党在选出其国府委员的同时，恢复了以前已裁撤的中央政治会议，出任这一委员会秘书长的正是美国人一直认为是国民党内最保守、最反动的力量CC系的领导人陈立夫。司徒雷登认为，这一举措颇耐人寻味。他估计这个委员会对控制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和国民党决策，将发挥重大作用。

司徒雷登感到，新的国府委员会能否实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具体改革，还是一个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蒋介石的态度，他到底能否听从开明进步官员的忠告，能否对效忠他个人的反动幕僚毫不让步还很难预测。司徒雷登明白，尽管国府委员会在名义上是高于行政院的政策机构，但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实际权力仍很难说。因此，司徒雷登在会见蒋介石时表示，美国舆论对国府委员会的改组普遍持赞扬态度，但有所保留，直到有证据表明，这个新的政府机构有多大权力，以及它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为止。这实际上是敦促蒋介石赋予国府委员会以名副其实的权力。司徒雷登并鼓励说，目前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中国将由他开始，从长期的“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4月25日，FRUS, 1947, VOL. 7, P. 109.）

在组建新的国府委员会的过程中过程中，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还就新政府的施政方针进行了磋商。三党各自提出了施政方案，最终在民社党所提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4月18日，新政府将其政治纲领公开发表，共12条，其主要内容有：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之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力谋政治上之进步与国家的安定；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应依国府委员会之决策，负执行之全责，立法院的职权，应同样尊重，行政当局，遇有提案，应出席立法院说明；对于各省行政，应本军民分治与因地制宜之原则，作彻底之检讨与改革；因训政需要而设立的法制与机关，在国民政府改组后，应予废止或裁撤；整理税制，减少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之逮捕与干涉；各省市县参议会及地方政府，应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从文字上看，这一纲领对于多党合作、国府委员会的决策权力、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立、军民分治、保障人权等都有所规定，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希望。（《施政方针全文》，见《中央日报》，1947年4月18日。）

接着而来的是对行政院的改组。在对这一握有实权的政府机构的改组过程中，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诚意显然令人怀疑。在行政院的17名部长和主任委员中，非国民党成员只有4人。而且，国民党把至关重要的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司法行政部等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非国民党人士所出任的只是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经济部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职。政学系的张群担任了行政院长。

二

然而，新政府组成后并未在推动改革上采取有力的举措。相反，却对进行反内战活动和对国民党表示不满的学生采取了镇压措施。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如此处理学生运动很不满意。他认为蒋介石等人把学生运动和其它闹事都解释为共产党的煽动和利用，这是高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是共产党，仅仅是普通的中国百姓，他们关心自己的生存，希望表达他们的愿望，即普遍高涨的和平愿望。司徒雷登认为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的武力镇压政策是一种“愚昧态度”。（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6月4日，FRUS, 1947, Vol. 7, P. 161.）

司徒雷登主张因势利导，把民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他在会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时表示，政府应妥善对待公众的和平要求，公布并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显示出民主和社会改革迹象，这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6月19日，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司徒雷登指出，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措施包括：组织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工作班子，向人民发布与共产党谋求和平的宣言；所有的人都应贡献其能够贡献的力量和财富；政府应尊重公民的自由，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司徒雷登还建议蒋介石本人周游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投入到新的运动中去。（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6月19日，FRUS, 1947, Vol. 7, P. P. 191-192.）

马歇尔在7月上旬向蒋介石发来一封信。马歇尔在信中强调，中国问题的基本的和永久的解决，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作出，美国只能在预见到将会有良好的结果时加以协助。司徒雷登在解说这一信件时，直接把美国提供援助与国民政府的改革联系起来。他指出，国民政府的政策调整是美国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与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应围绕着宪法在政府内部进行改革，内容包括：有更高权威的代表团体，公民自由权的建立及保障，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工作关系。（《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即《美中关系白皮书》），第29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8月10日，司徒雷登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再次把改革作为美援的条件而提出。他表示：美国一直准备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人民的支持。司徒雷登在这此谈话中提出的改革内容包括：国民党应与政府完全分开；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裁减官兵，使军队少而精，训练有素，装备优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官吏中盛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条款生效。司徒雷登并带有责备的意味对蒋说，他本应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他更多的只是一党之魁。（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8月11日，FRUS, 1947, Vol. 7, P. P. 252-253.）

当司徒雷登正敦促蒋介石进行改革之时，美国政府事先未与中国政府商量，也未与其驻华大使馆通气，便宣布派遣魏德迈使团来华。1947年7、8月间，魏德迈使团走过国统区的许多重要地方，与朝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离华前，应蒋介石的要求，魏德迈于8月22日在国府委员会与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谈了他的访华观感，引起了相当的震动。魏德迈在讲话中尖锐地指责了国民政府中存在的腐败和专制

行为，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能用武力击败”，要想战胜共产主义思想，唯一的方法“是以另一种更符合人民意志获得人民支持的思想与之斗争”。这就要求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及经济上肃清贪污无能，以求公正和平等，并保障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必须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魏德迈中将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47年9月22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765—768页。）

魏德迈的讲话非常坦白地指出了国民政府的缺点，作为一个外国人，其语气之严厉，颇令一些国民政府的政要深受刺激。然而对司徒雷登来说，这样的讲话正合其意，他从内心感到高兴。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单枪匹马而效果甚微的劝说之后，他希望魏德迈此举将会将会新的冲击力，“只有这样才能棒喝领导人的惰性与自满，促使他们克服困难。”（司徒雷登致魏德迈，1947年9月12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与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月下旬，司徒雷登对局势的估计更加悲观，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评估说：“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如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国民党内充斥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必须铭记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败。”他对改组后加入政府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深感失望，认为他们对政府工作贡献微薄，只是忙于为自己的党员捞取一官半职。其贪心于争权夺利，甚至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9月20日，10月29日，同上书，第130，132页。）

尽管对国民政府已经大感失望，司徒雷登仍然幻想美援的到来会对国民政府的改革起到某种推动作用。他认为，美援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可以利用这一杠杆，每当国民政府有进步迹象时，即向它提供它所渴望的援助，在其反动分子或腐败势力有所抬头时，即停止这种援助。1947年11月，马歇尔在国会提出了3亿美元的援华拨款建议。司徒雷登决定利用大批美援即将到来这一机会，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12月22日，他草拟了一份准备在中国发表的声明。1948年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出经济援华法案，司徒雷登遂于2月19日公开发表了他的《致中国人民书》。

《致中国人民书》在大讲了一通现代民主的好处后说道，中国的历史表明，老百姓所追随的是他们所信赖的的开明领袖，这是一种旧式的中国民主程序。把它改变为现代宪法程序，将会消除各地区、省及地方政府中的腐败无能分子，那些民选产生、为民谋利的人士将能取而代之。他指出，在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不能够有理性的自由。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屈服于恐惧，或被灌输，或干脆被清除。目前中国面临的危险日益加剧，这就必须继续坚持让宪法权利充分告白于天下，必须唤起公民意识，使之得以充明确地表达，以反对政府官员的弊政。作为一个外国大使直接向驻在国人民呼吁，这实在有些不同寻常。司徒雷登事后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表示，他的《致中国人民书》不应被解释为攻击中国现政府。（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7年12月22日，1948年2月23日，《被遗忘的大使》，第142—144，156—157页。）

三

进入194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形势继续恶化。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领导进一步感到失望，他对蒋介石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觉察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都日益厌弃国民政府，普遍对政府领导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即使在一向最忠于蒋的那些人中，也出现了对其政策不满的明显迹象。司徒雷登感到，“现在需要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而委员长看起来很难做得到。”（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3月31日，FRUS, 1948, Vol. 7, P. 173.）

随着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日益增加和公开化，美国驻华大使馆在3月18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预测：中国政治上一个变革的年代正在到来。造成这种变革的力量，不是立刻全都可以看出来的，但其轮廓已开始呈现，其特征是：现政府的领导正逐渐为从前支持过它的人所反对，这些反对派正成为具体的和有组织的，现在的当权者除非获得我们的积极支持，几乎一定要垮台。（《美中关系白皮书》，第920页。）3月31日，司徒雷登又进一步预测，如果蒋委员长无所作为或努力太晚的话，国民党内逐渐增多的反对派可能会另觅领导人，而使他下野，并将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司徒雷登似乎希望出现这一局面。促使司徒雷登作出这种预测的契机是，随着行宪国大的即将召开，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日益活跃，并显示出逐渐聚集的趋势。

对于是否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举行普选并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内部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着严重分歧。对此，蒋介石指定了几位中央核心成员进行研讨，但他们之间仍未能达成共识，只得提请蒋介石裁决。根据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给蒋介石的报告，主张延缓进行选举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共产党势力猖獗，国民党各级党政人员将最为重要的勘乱工作置于脑后，把精力耗于搞选举这样的“不急之务”，共产党将乘机发展；二是担心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内部会“分崩离析”，“同志变仇人，如何集中力量勘乱？”反对延缓者的理由也主要有两点：一是实施宪政的进程已由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如政府予以变更，“无异违宪”；二是担心国际舆论近已怀疑本党是否有行宪诚意，如现在宣布停办选举，“将使怀疑益深，于我国际地位愈益不利。”这里所谓国际舆论，主要是指来自美国的压力。

从双方的理由来看，不能说前者毫无道理。然而，蒋介石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在此件上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吴铁城致蒋介石，1947年11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第2卷，第813—815页。）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知道前者的忧虑并非多余，但他还是决定如期选举，并非是怕有违宪之嫌，实际上主张延缓者也早已为他找好了大体上可以成立的推迟选举的理由。不难看出，蒋所担心者实际上是怕对美国交待，推行宪政是美国人一直在敦促的事情，在最后关头的退缩将会使美国失望，对他指望得到援助产生不利的影

国民党内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如李宗仁等，此时目眇危局，也想利用选举的机会“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挽狂澜于既倒”。（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75页，广西1980年版。）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获得成功，李宗仁积极谋求美国的支持。3月27日，李宗仁宴请司徒雷登，谈了他决定竞选副总统的有关情况，表明了他不同于蒋介石的政治见解。李表示镇压共产党“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行的，它还要求政治改革”。（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3月31日，FRUS, 948, Vol. 7, P. 177.）这一观点正是司徒雷登所积极宣传的。

曾被司徒雷登寄予着较大期望的行宪国民大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期间召开，但会议的结果并未给司徒雷登带来多少新的信心。这次会议使蒋介石继续保持了绝对的权力。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根据大会新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可以不受宪法第39条和第3条的约束采取紧急措施。宪法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43条规定，如国事有重大变故，须作紧急处置时，总统可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发布命令一个月后，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中华民国宪法》，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715号，1947年1月1日。）勘乱临时条款取消了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最重要的两个限制条款，这样，总统与行政院可不必先经立法院同意，随时颁布紧急法令。司徒雷登认为，勘乱条款实际上给予了总统无限权力。

唯一给司徒雷登带来希望的是李宗仁终于当选为副总统。他认为，李宗仁的获胜“象征着CC系的彻底失败，对公开决定支持孙科的蒋介石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一事态还表明国民党内反对派对以CC系和黄埔系为中心的党务机构的独裁进行挑战的胜利。”尽管司徒雷登及大使馆的其它成员对李宗仁能否进行有效的领导，将国民党及政府内的这种情绪凝聚起来，形成富有效率、积极进取的反对派，还没有把握，但他们希望“在副总统选举中表现得那么明显的民主的波澜，会发展成为政府中反动分子的合法而有效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国民党内的反对力量，在本质上具有一种改革的要求。总之，这次选举使他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即“现在会有真正的和令人振奋的改革运动，来进行认为是国民政府要避免灾难所必须的改变”。（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4月29日，《被遗忘的大使》，第198—199页；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国务院，1948年5月1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921—923页。）

在蒋介石正着手组织第一届立宪政府之时，司徒雷登于5月6日拜访蒋，再次向蒋提出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司徒雷登强调，除非政府厉行改革，使人民相信其命运要比在共产党统治下好一些，否则，不管作多大军事努力和有多少美援，都不会成功。现在，形势严重，“唯一的希望是进行剧烈的改革，使人民相信政府不再是徒有空言，而是真正要付诸实施。”司徒雷登对蒋说，现在你已当选总统，宪法已经生效，美援正开始到来，这正是你进行改革的良机。如果现在无所作为，那么不用过多久，等你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时，那已经晚了。（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5月7日，FRUS, 1948, Vol. 7, P. 225.）

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与李宗仁加强合作，推进改革。但蒋介石的个性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蒋对李宗仁的当选深感恼火，利用举行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的机会，他给李宗仁发去了一个极端轻视他的信息：副总统可有可无。在这一就职仪式中，蒋完全无视副总统的存在，把李宗仁撇在一边。典礼结束会，蒋径自乘车离去，对李也未加理睬。此后，有关军政大事的重要会议，蒋不让李参加。招待外宾的重要宴会，蒋也不邀李陪客。李宗仁感到，他从原来的北平行辕主任升任副总统，“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转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96页。）李宗仁很消极，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干什么，他甚至表示考虑去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国内更可能有所成就。

5月24日，司徒雷登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指出，目前是他毅然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应任命一位能担负此种行动的行政院长。司徒雷登并建议蒋介石解散CC系。司徒雷登期望能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但他的这一期望再次落空。等到第一届行宪内阁宣告成立后，司徒雷登对这个班子颇感失望，他认为新政府的人马大多是从旧人物中选出来的，少数新的成员也是被旧人物所控制，因而不会进行重大的改革。他还注意到，在军事系统的调整中，顾祝同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余汉谋被任命为陆军司令。他认为这两人长期以来在军事上毫无成就，只是擅长投蒋之所好。

对于行宪国大后蒋介石的这些举措，司徒雷登及大使馆的其它成员都深感不满。他们认为，蒋辜负了国民大会对他的期望，“他一方面保持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却没有提出新的计划。他拒绝李宗仁担当它的顾问，而仍旧依靠不称职的人来领导在新政府各部。蒋明显地企图继续其个人统治，而无意遵从大众对于改革的要求。普遍的不满情绪发展起来，蒋比他一生中任何事后都更为不孚众望。”（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48年6月12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924页。）

四

从此，蒋介石能否胜任其任职的问题在司徒雷登考虑中反复出现。他开始考察那些能够继承蒋介石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除了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力量如李宗仁等寄予希望外，还对积极活跃于国民党政权之外的政治力量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李济领导的民革甚受重视。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曾与民革领导人进行过多次接触。李济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详细谈论了民革的计划和政策，声称他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会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参加他的政府，从而组成比现政府更有能力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政府。

司徒雷登对李济颇为欣赏，他认为李济作为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国民党中国将受到除蒋介石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外的所有分子的广泛欢迎。现政府缺乏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能力，除非能够找到必要的鼓舞人心的领导。而蒋介石并不能提供这种领导。他只打算坚持个人统治，这导致了目前糟糕的状况。司徒雷登预言政府的地位将进一步崩溃，最终或者将被内部的开明领袖，诸如李济这样的人发起的革命所取

代，或者直接被共产党取代。

7月12日，司徒雷登在对中国局势的评估中认为，现政府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他预测，一旦现政府垮台，最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局面是：1. 共产党统治全部或大部中国，如果国民党仍不采取重大的改革行动，尤其会这样；2. 出现一些地方政府；3. 一个比较自由、较得人心及有效率政府取代CC系控制的国民党。在后两种情况下，民革都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有杰出的领导人，其最基本的纲领是耕者有其田、停战及组织联合政府，这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7月16日，FRUS，1948，Vol. 7，P.P. 364-365.）

司徒雷登再作努力，敦促蒋捐弃前嫌，建议蒋召集几个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领袖，让大家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抛弃所有的个人与政党偏见，组成共渡难关的领导核心。然而，这次谈话显然并不成功。司徒雷登在会见后总结说，这次谈话的“最显著的印象是徒劳。我非常怀疑蒋委员长是否具有那种伟大的品质，使他能够召集那些并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人物，把他们视为同志，让他们各抒己见，最后达到意见统一，决策一致。”（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7月17日，FRUS，1948，Vol. 7，P.P. 366-367.）

1948年8月，面对法币的飞快贬值，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动作，即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而改行金圆券。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行动，如获成功，国统区的经济和社会便可获得暂时的稳定，如果失败，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心，从此将不可收拾。结果是失败了，金圆券没过多久便也陷入了飞速贬值的恶循环圈。由于最初强制人们以金银及外币兑换金圆券，这就将中下层民众仅有的一些积蓄剥夺一空，国民党政府由此而失尽民心。

司徒雷登开始认真地考虑抛弃蒋介石的问题。他感到，倘若美国在蒋被全体人民所唾弃以后继续支持他，结果将是弊多利少。10月23日，司徒雷登在致马歇尔的请电中明确地提出了考虑让蒋下台的问题。他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一些办法，并请指示是否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它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是否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党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马歇尔不同意由美国方面出面这样做。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劝蒋退休，或推荐其它中国人担任新的领袖，那美国就得对日后中国出现的新的局面承担责任，就必须不顾美国的利益如何而支持继承蒋的政权。（《美中关系白皮书》，第327—328页。）

尽管国务院不同意作正式表示，但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驻美人员透露，只要蒋在位，就不可能指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司徒雷登在与国民党要员的谈话中也表示了希望蒋下台的意图。12月13日，张群以蒋的使者的身份与司徒雷登谈话，说蒋从各方面获悉，人们希望引退，甚至美方也有此意，蒋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听听他的意见。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张群终于得出结论说，要委员长引退的是美国。司徒雷登回答说，大多数美国人民有这样的印象，即绝大部分中国人民感到蒋委员长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从权力统治中退出。而中国人民的所想所愿正是美国拟定政策的基本因素。

12月17日，司徒雷登又在与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的谈话中阐述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希望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展，但是，美国不能靠支持一个丧失民心的政府来达到这一目的，那将有背于民主原则，而美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违反民主原则才反对它的。司徒雷登向孙科指出，作为行政院长，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支持蒋，那么面临的是不得人心，军事失败，财政恶化；要么背离蒋，劝说蒋放弃紧急处置权，放权给行政院。

此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实力派也发出了要蒋下台的呼声。在内外夹击之下，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发布了引退文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这样做并非下台。宪法规定副总统继任总统职权有两种情况，即“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中华民国宪法》，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715号。）蒋介石拒绝了由李宗仁继任总统的要求，而颇有用心地采用了“引退”一词，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样，一旦他认为有必要“视事”时，他仍可以收回权力，恢复其总统职位。此外，蒋介石仍然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位，他仍是执政党的领袖，可以干预党政决策。蒋介石引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份党内指示中便明确地要求，“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蒋总裁引退对全党同志指示文”，1949年1月24日，《战后中国》，第2卷，第940页。）

因此，李宗仁虽然终于走到前台，司徒雷登却并不象当初所期望的那样兴奋。一是他注意到了“引退”的奥妙，认为此举说明副总统仅仅是在总统的位置上履行权力，这就意味着总统随时可能归位，从副总统那里收回权力。他还明白，蒋介石现在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多是蒋介石的门生，他们只听命于蒋介石；二是军事形势实已无法挽救，国民党主要的精锐兵团在三大战役中已被消灭，共产党兵临长江，现在进行任何改革都已无力回天。而共产党提出的强硬的谈判条件，使得接受条件无异于投降。因此，当李宗仁就职后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或致函表示赞许和支持李宗仁政府时，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政府应保持沉默。

面对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的必然结局，司徒雷登在2月5日致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中，对近年来他所亲眼目睹的国民党政府衰落发出了感叹：政府中不乏政治自由人士，但体制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国民党政府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使得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他断言，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被遗忘的大使》，第278—280页。）

因此，尽管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个人持着赞赏的态度，但除了要求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现有规模上的经济援助外，并没有提出其它大力扶助李宗仁的要求。4月中旬，即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李宗仁向司徒雷登提出，希望美国总统或国务卿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共产党渡江将被视为

美国的威胁，如果共产党采取这样的行动，美国将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司徒雷登对李的处境深表同情，向国务院建议采取由参议员就渡江影响发表谈话等变通办法。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美国政府准备以某种有效的援助来支持这样的声明，我对李宗仁的请求是不能表示支持的。”（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4月15日，FRUS，1949，Vol. 8，P. 241.）在大厦将倾之时，美国政府自然更不会冒险卷入，它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标志着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府所有希望的彻底终结。虽然他名义上仍是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但他并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而是决定继续住留南京。他与共产党官员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影响共产党政策的改变。但司徒雷登的作法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8月，在《美中关系白皮书》即将发表之时，司徒雷登离华返国。

五

本文的原意只在梳理一下司徒雷登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的活动。然而，在叙述了这一过程之后，作者发现，本文将不得不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一、司徒雷登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政府的態度？

司徒雷登身为美国驻华大使，是这一时期中美政策沟通的一个中心人物。司徒雷登并非仕途出身，而系以一民间教育家担当一国大使之重任，似乎缺少充分的政治阅历。司徒雷登的传教士和教育家的独特的个人背景，无疑也使其行动带上了他个人的特色。作为美国道德观念的长期传播者，他虔诚地相信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挽救一切腐败政府的良方。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向蒋介石，向国民政府要人，向他所接触的中国百姓。白皮书是这样评说司徒雷登的工作的，“在与中国政府领袖们的会谈中，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的势力，并推行基本的改革措施。”（《美中关系白皮书》，第289页。）孜孜不倦地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直到最终失望，可以说是司徒雷登任职的一大特色。可以想象，假如由赫尔利那样的政坛老手出任此职，情况可能将大不相同。

在司徒雷登的任期中，尤其是在后期，他的一些观点与职业外交人员和政治家们发生了分歧，如在是否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是否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以及后来是否要与胜利了的共产党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司徒雷登都与国务院持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司徒雷登偏离国务院指示的情况，资中筠先生《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1章为我们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研究。）但是，在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上，应该说他是完全秉承华府的意旨而行动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与美国对华政策相符合的。

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先进行改革才能提供美援还是先提供美援再进行改革的矛盾。把改革视为美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司徒雷登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一些决策人物都持有这种观点。如远东司长范宣德就认为，不实行剧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国民政府是无可挽救的，美国提供的援助也难以发挥作用。国务卿马歇尔本人的观点也是：只有实行剧烈的改革才能救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把反动的派系从国民党内清洗出去。（福泪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第26—2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美国的历史传统、政治观念及现实处境等因素决定了当时的美国不可能全面地承担起援蒋的重任。它的原则是“自助者天助”，要求国民党首先“自助”，然后才会有来自美国的“天助”。美国只准备在它看到自新的国民党政权有取胜希望时才作较大投入，而不愿意全部靠自己的力量去扶持一个腐朽不堪的政权，这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这一时期魏德迈使团所得出的结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魏德迈一行在华的行动是完全独立于美国大使馆的，但他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却与司徒雷登所主张的并无二致。在离华前所发表的声明中，魏德迈公开指出：“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实施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魏德迈中将结束赴华使命的声明”，1947年8月24日，《美中关系白皮书》，第769—790页）。

是否可以这样说，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是任何一个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都要

做的事，司徒雷登只是做得比别人更加热心而已。

二、司徒雷登所期望的改革能否拯救国民党政府？

司徒雷登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很庞杂，包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建议，有的被国民党政府采纳了，有的被装点门面式地实行了，更多的则是被束之高阁。本文所要提出的是，如果一切都照司徒雷登所建议的那样去做，国民党政府能否免于失败的命运？作者的看法是：未必。

大半辈子从事传教和教育事业的司徒雷登晚年入仕，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有的明显地带着书生气。如司徒雷登曾对“平民教育”很感兴趣。他设想在国民党新占领的地区推行这一运动，把居民组织起来，“教育他们懂得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即使是那些地位最底下的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力和应尽指责”。（《在华五十年》，第184页。）他认为，人们在明白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便会自觉地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压

和暴政。他把“平民教育运动促进会”的晏阳初请到南京，商谈后决定把范围扩大，计划对成千上万苦于找不到机会的学生加以训练，而后掀起一个振兴国家的运动。后来，晏阳初为筹措美国资金在美国呆了一年多，因形势发展太快，该计划遂不了了之。在这一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的本色。

司徒雷登尽管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但他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还是带着一个外国人常常会有有的隔膜感。例如军政分离问题，在美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军人干政是绝对不许可的。因而司徒雷登曾多次提出，省主席应由文官担任。魏德迈在联席会议的讲话中，也主张不应由军人担任省主席，市长和县长等职。军人不得属于一个特定的政党。任何军人不得担任政府职位或为一个政党的积极活动的党员。

显然，无论是司徒雷登还是魏德迈都不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军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美国政治不同，中国军队不仅不能脱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还在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尤其在战争时期，更不待言。在一切为了战场胜利的时候，军权盛于民权，或统一军政领导是中国政治中常有的事情。对此，蒋介石曾与司徒雷登争辩说，虽然从理论上讲，省主席应由文官担任，但在目前情况下，文官很难与军人统治对抗。他表示他已作过几次努力，但在目前他很难规劝精明能干者接受省主席这种职务。蒋介石可能说的是实话，当省主席处于近似于后勤官的地位时，确实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司徒雷登还曾提出过裁官减兵，实行精兵政策的建议，在战场消耗很大，征兵拉夫犹恐不及之时，这样的措施显然也是无法实行的。

司徒雷登提出的某些建议，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司徒雷登的改革建议毫无可行之处，那就错了。实际上，司徒雷登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即要求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惩办贪官污吏以及增加政府工作的公开性等，对于改善政府和赢得民心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在司徒雷登改革计划的主观目的和它必然要产生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摆脱的矛盾：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发展，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通过改革来巩固国民党政权，而真正实行了剧烈的改革，其结果却并非一定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来说，民主改革常常不能起到“补天”的作用，而只能起到促使其分崩离析的“拆台”作用。这一现象在这以后的世界发展史中并不少见。

司徒雷登的大部分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谁也无法绝对地肯定其必然结果如何。但我们已经看到，仅仅是行宪国大的召开，就已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其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原有的裂痕更加扩大更加公开化。如果真的大张旗鼓地惩治贪官污吏，如果开放言论，让人们自由集社游行，让人们畅所欲言，一句话，如果真正地触动了数十年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很难设想国民党政权是会获得新生，还是会更快地走向崩溃。如果说在和平条件下，经受改革的专制政权，尚存在或新生或崩溃的两种可能，那么，在战争条件下，在存在着一个正蓬勃向上并欲取而代之的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也许注定只能加速它的崩溃。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府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充满热情到幻想破灭的过程。当他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行进的隆隆炮声中离开这块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时，他怀着许多遗憾。尽管他已作了许多努力，但依然是流水落花春不归。他不明白，他想以美国民主之石来补国民党专制之破天，这一企图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 ——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
- 下一篇文章：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胡适与俞平伯
- “纪念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 瞿同祖（近代史研究所）
- 杨天石（近代史研究所）
- 蒋大椿（近代史研究所）
- 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
- 朱东安（近代史研究所）
- 虞和平（近代史研究所）
- 闻黎明（近代史研究所）
- 姜涛（近代史研究所）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